

· 政治学研究丛书 ·

MINSHENG ZHENGZHI: XINNONGCUN
JIANSEZHONG DE NONGMIN RENTONG

彭正德 著

民生政治：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认同

——湖南五县十村考察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彭正德，湖南茶陵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湖南省青年社会科学研究“百人工程”人才培养对象。1996年至2003年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2005年至2008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政治学理论专业，获博士学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青年项目1项，主持省部级项目5项，出版专著《生存政治》，在《政治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责任编辑：曲建文

本书策划：

封面设计：



民生政治：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认同

——湖南五县十村考察

· 政治学研究丛书 ·

本书以湖南省长沙县、醴陵市、湘潭县、湘乡市、衡山县的十个村庄为个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政治认同进行实证考察与理论分析。个案村所在的五个县，是毛泽东1927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调查过的五个县，在湖南和我国中部地区较为典型，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作者的研究发现，由于农村民生的改善，农民的政治认同总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社会基础和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支撑，但是农村广泛存在的消极社会心理潜藏着弱化农民政治认同的危险；尽管农民具有较强烈的民主意识倾向，这种民主意识倾向以及农民对民主权利的需求，也许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更趋强烈，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农民对民生福利的需求比对民主权利的需求更为迫切，民生政策在增强农民政治认同方面发挥着比民主政治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当前，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关键在于改善农村民生。

微信扫描（ID：cctphome）



ISBN 978-7-5117-2322-2



9 787511 723222 >

定价：62.00元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本书的出版得到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省级重点学科资助，谨表谢忱。

MINSHENG ZHENGZHI: XINNONGCUN
JIANSEZHONG DE NONGMIN RENTONG

彭正德 著

民生政治：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认同

——湖南五县十村考察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生政治：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认同：湖南五县十村考察 / 彭正德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117-2322-2

I. ①民… II. ①李… III. ①农民—政治思想—研究—湖南省 IV. ①D42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5130 号

民生政治：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认同 ——湖南五县十村考察

出 版 人：刘明清

出版统筹：董 巍

责任编辑：曲建文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402 千字

印 张：20.5

版 次：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2.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目 录

导 论	1
一、研究缘由	1
二、研究综述	2
三、研究方法	9
第一章 农民政治认同的基本理论	12
一、基本内涵	12
二、主要类型	19
三、重要功能	23
第二章 农民政治认同的多维审视	29
一、认同层次	29
二、主体差异	41
三、影响因素	53
四、政治效果	59
第三章 民生政策与农民认同	66
一、税费改革	66
二、合作医疗	78
三、义务教育	91
四、社会保障	101
第四章 民主政治与农民认同	108
一、政治认知	108
二、政治评价	120
三、政治信任	133
四、政治参与	148
第五章 农民政治认同的提升路径	159
一、认同机制	159
二、主要问题	166
三、对策建议	175
结 论	180
参考文献	183
附录：调查纪实	189
后 记	257

导 论

一、研究缘由

我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关注始于 2005 年。当年，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该中心是教育部的重点研究基地，在国内政治学界颇有名气，受其研究氛围激励，我于年底完成了一篇小论文《我国转型期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倾向探析》，这篇论文在一年后才发表出来，但在论文发表之前，我已开始认真思考农民政治认同问题，并决定以此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这一想法得到了我的导师、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于建嵘先生和徐勇先生的同意。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我的博士论文得以顺利完成，出版时更名为《生存政治：国家整合中的农民认同》。该书是以 1950—1980 年的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作的实证考察与理论分析，所依据的主要是醴陵市档案馆保存的大量珍贵档案，此外还有我在醴陵农村的访谈资料。

概括而言，对于农民政治认同的解读，当时学界有两种颇具影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政治认同基于道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基于权利，而我在《生存政治》中提出的观点是基于生存。醴陵县的档案所记录的农民政治生活的变迁过程告诉我，农民政治认同的形成和演变在本质上是农民受生存理性的支配与政治权力进行社会交换的互动过程，政治地位的根本改变和生存状态的改善带来了农民高度的政治认同和服从，而对生存威胁的感知则延伸出农民的不满和各种抗争行为。在确定研究计划时，我本来打算将个案考察的时间延续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但是随着资料收集工作的展开和研究思路的清晰，我发现原有的打算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农民为“吃饭”问题所困扰，“生存”的含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与存在，而是与饥饿和死亡抗争的“活着”，用斯科特使用的比喻讲，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农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农民“生存”的含义发生了改变，用“基于生存”的观点自然难以概括农村改革后的农民政治认同机制。但是，如果把研究的时间范围截止在 1980 年，又缺少对现实的关注。在我犯难时，于建嵘先生鼓励我说，政治学中的许多“历史研究”也非常有学术价值。思考再三，我最终将个案考察的时间限定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这样安排，解决了研究的逻辑问题，但同时也留下了遗憾，毕竟农村税费改革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极大地改变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弥补这一遗憾的念头，是我研究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治认同的初衷。

新世纪的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大调整，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人们对此有不同的评说。在我看来，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为构建稳固的农民政治认同提供了非常好的时机，而且从政治角度看，新农村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构建稳固的农民政治认同。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出现了三次重大调整，第一次是新中国初期的土地改革，第二次是 1970 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第三次就是新世纪的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前两次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调整都带来了农民政治认同的高涨，形成了新中国以来农民政治认同的两次高峰，那么第三次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调整对农民政治认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的确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学术问题。我以此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得立项。课题既已立项，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现实压力，不管最终做得怎么样，必须认真对待，努力做好。

开展这一研究，也与导师的期待和鼓励有关。《生存政治》出版之际，徐勇先生欣然为该书作序。在序言中，徐先生指出，认同与反抗已成为学术界的前沿问题，《生存政治》“以

1950—1980 年的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对这一时期的农民反抗与认同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特别是该著作围绕‘生存’这一主题展开,分析了农民反抗与认同的根源——基于生存,提出了农民的生存政治学,由此将著作从个案材料层面提升到学理研究层面。读者既可以从书了解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信息,更可以得到理论上的启示。”在给予溢美之词的同时,徐先生也对我提出了期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解决了‘天大’的问题——吃饭问题,一般农民的生存已不是基本问题。但我们也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群体性事件也在不断增多,反抗与认同仍然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本书没有论及,但我觉得正是需要继续探索的……期待本书的作者对此作出进一步的研究。”徐先生的期待既给了我很大的压力,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而他在序言中表达的一些深刻见解——比如对农民理性的分析等,又给了我很多启发,徐先生实际上是在给我指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在我申报课题和制定田野调查方案时,于建嵘先生也给了我点睛式的指点和宝贵的鼓励。面对期待与鼓励,我没有理由退缩。

二、研究综述

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我国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增多,于是政治认同问题为国内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由于社会成员基于不同的职业、阶层、身份等因素会产生不同的政治态度,因此学者们对政治认同问题研究的深化必然会以不同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随着 1990 年代以来“三农”问题的不断升温和国家农村政策的变化,一些学者把研究目光投向农民这一社会群体,研究农民的政治认同,即农民对现存政治系统、政治规范、政治秩序、政治价值观的情感倾向和态度。在探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治认同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国内学界关于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这样才可能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

(一) 研究现状:主要内容与理论观点

国内学者对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认同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观点:

1. 关于农民政治认同的程度

学界的相关研究揭示,建国以来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程度总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但在不同时期并不均衡:农民的政治认同在建国初期和 1970 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时期形成了两次高峰,两次高峰之后则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和波动。大量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农民政治认同的两次高峰,^①这种政治认同主要表现为农民对党和国家政策的政治热情、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对政治领袖的尊崇或乡村政治秩序的优化。多数学者认为,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政治认同程不断下降趋势,如张乐天^②、高王凌^③通过对农民行为的研究揭示了人民公社内部始终存在的“离心倾向”,刘娅^④、张海荣^⑤认为人民公社压抑了农民的自主需要,带来了农民对公社的“消极、反感和失望”,甚至引起农民“强烈的对抗情绪”。而学界对 1990 年代以来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或抗争行为的研究则反映了市场化进程中农民政治认同的下降和弱化。^⑥

^① 代表性著作有陈吉元等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王春光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杜润生主编的《中国的土地改革》和《中国农村制度变迁》、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李立志的《变迁与重建:1949—1956 年的中国社会》、徐勇的《包产到户沉浮录》、丁龙嘉的《改革从这里起步:中国农村改革》等。

^② 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15—317 页。

^③ 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年版。

^④ 刘娅:《目标·手段·自主需要——人民公社制度兴衰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⑤ 张海荣:《人民公社解体再探》,《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 6 期。

^⑥ 代表性论著有方江山的《非制度政治参与——以转型期中国农民为对象分析》、程同顺的《当代中国农村

对于农民政治认同的第一次高峰,少数学者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农民政治认同的程度在土改之后的农业合作化时期处于较低水平,例如陈定洋认为,家族自古以来是农民的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认同和行动单位,合作化政策超越了农民认同家族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因而未能真正得到农民的认同;^①李巧宁认为“绝大部分农民不是经过自己的理性选择,而是或被挤、逼,或被经过着力渲染的宣传内容所诱惑,或随大流而进入合作社的”。^②

对于农民政治认同的下降和弱化,学界关注的主要是1990年代以来状况。肖唐镖的调查显示,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持有较强的认同,但农民对各级党政组织的认同是分层次的,中央的威信最高,次为省,再次是县,然后是乡,最后是村,而且认为实践中的社会制度与心目中的标准有着较大的差距。^③郭正林的调查认为,在农民的权威认同心理中,乡政权处于弱化的地位,而以亲缘—血缘为基础的非正式权威更能获得农民的认同。^④别红暄论述了中原农村政治认同的弱化现象,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权威在下降,农民对行政权力产生了疏离感。^⑤彭正德分析了农民政治认同弱化倾向的行为表现和基本特点。^⑥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展开,一些学者研究了农民政治认同出现的新变化,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于建嵘认为,近十年来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从对具体工作人员的质疑发展到对政权体制的不满,二是对法律的正义性和公正性表示怀疑,三是合法性危机的对象在加速上移。^⑦但是李云通过对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先进典型村的调查研究认为,农民对党的认同度由新农村建设前的不断下降变成逐渐回升,农民原来倾向于认同高层党政组织而抵制基层党政组织,新农村建设开展后,对基层党政组织的信赖也渐次增加。^⑧

2. 关于农民政治认同的功能

农民政治认同的功能是学界关注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出发点。尽管有学者指出,“政治认同度高了,就意味着政治稳定;反之,政治认同度低了,就预示着政治危机”的逻辑“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会使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得出不科学的结论,^⑨但是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民政治认同的提高与其抗争行为负相关,而与政治稳定正相关。

既有研究主要是从农民政治认同弱化与抗争性行为关联的角度强调农民政治认同的积极功能的,基本观点是:农民的不满、怨恨和愤慨情绪的宣泄是其政治认同下降的表现,而抗争性行为是其宣泄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消解农民抗争行为、维护政治稳定的基础在于提高农民的政治认同。比如肖唐镖认为,政治稳定的根本性基础在于政治认同,农民表达对党和政府不满的行动方式,反映着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价值取向,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充分信任时,就往往采取“沟通性”行动,信任尚未完全丧失时,就有可能实施“逼迫性”行动,如果不再相信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他们就有可能发生“敌视性”行动,或者出于“认命”观念,安于现状,进行“日常抵抗”。^⑩于建嵘指出,农民的“维权抗争”和“泄愤”行为与其政治认同的下降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加强农民的政治认同。¹¹

政治发展研究》、于建嵘的《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及其发表的系列论文。

^① 陈定洋:《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行动逻辑——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认识》,《农业考古》,2007年第3期。

^② 李巧宁:《农业合作社与农民心态》,《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

^③ 肖唐镖:《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状况——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④ 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定量研究》,《学术研究》,2005年第5期。

^⑤ 别红暄:《论中原农村政治认同弱化的原因及对策》,《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⑥ 彭正德:《我国转型期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倾向探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⑦ 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⑧ 李云:《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党认同心理的新变动》,《青海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⑨ 孔德永:《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认同研究刍议》,《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⑩ 肖唐镖:《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状况——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¹¹ 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也有些学者从正面论述农民政治认同的功能。比如季丽新、南刚志认为,“农民的政治认同对于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维持起着关键作用,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基础。”^①彭正德认为,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对既有的政治秩序和政治体系基本上是认同和服从的,其抗争性利益表达行为也就体现出服从的倾向,成为一种“服从的抵抗”,推动了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创新,促进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政治沟通和乡村社会的稳定。^②

3. 关于农民政治认同的影响因素

概括而言,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是从权力、利益、权利、文化四个角度进行的,权力视角强调党和国家运用政治权力直接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干预和塑造,利益视角涉及的是国家政策对农民经济利益的影响以及农民对生存压力的感知,权利视角主要涉及农民的民主权利意识和社会公正观念,文化视角则重视乡村传统对农民政治态度的影响。

大多数学者认为,利益是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主要因素,利益的获得是农民认同政治秩序和规范的坚实基础,利益受到威胁和损害则容易带来农民政治认同的下降。土地改革之所以带来了农民政治认同的高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生活有了较明显的改善。^③同样,新时期的农村改革让“农民获得了以户为单位的经营土地的权力”,“粮食产量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因而出现了国家与农民的“第二次蜜月”。^④而“利益冲突加剧、农民负担过重”则是1990年代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首要原因。^⑤郭正林的调查发现,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同他们与公共事务的利益关联度相关,在刚实行村委会直选和村务公开时,农民的积极性很高,但一年之后热情逐渐减退,“主要原因是村民认为村里开会讨论的许多事情跟他们的切身利益没什么关系,而且许多会议讨论是决而不行,不见实效。”^⑥

在利益因素的基础上,学者们也特别重视政治权力技术等因素对农民政治认同的影响。郭于华和孙立平认为,由于党在土地改革中成功地开展了诉苦运动,从而使农民形成了“建立在感激和敬畏双重基础上的国家认同”。^⑦彭正德认为土改中的诉苦是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一种重要心理机制,通过诉苦,“农民对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的感激、信任、依恋、拥护之情被放大和强化”。^⑧周晓虹认为,共产党因为成功运用经济、政治和行政三大杆杠巧妙作用于农民传统社会心理,从而激起了农民对合作化政策强烈的认同和狂热的政治行为。^⑨李立志发现,农民的领袖崇拜心理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顺从领袖意志的行为趋向,导致了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积极的“情感性”参与心理。^⑩这种观点被许多学者在研究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时所接受。¹¹郭正林特别提到了乡村传统因素的影响,他认为,农民在乡村传统的影响

^① 季丽新,南刚志:《在新农村建设中加强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7年第3期。

^② 彭正德:《农民政治认同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③ 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67—569页。

^④ 曹树基:《国家与农民的两次蜜月》,《读书》,2002年第7期。

^⑤ 于建嵘:《我国现阶段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6期。

^⑥ 郭正林:《乡村治理及其制度绩效评估:学理性案例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⑦ 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45页。

^⑧ 彭正德:《土改中的诉苦: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一种心理机制》,《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

^⑨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7—172页。

^⑩ 李立志:《变迁与重构: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页。

¹¹ 例如朱智宾:《农业合作化迅速完成的农民心理分析》(《世纪桥》2003年第3期),宋徽瑾:《农民对待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心态分析》(《绥化师专学报》2004年第3期),张齐学:《试析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党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王萌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顺利发动的几个因素浅析》(《理论观察》2001年第5期),黄金魁:《农民社会心态与人民公社化运动》(《零陵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下有着“家族集体主义”情结,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如果能够为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就会获得农民的认同,否则,农民基于“对福利、安全和道德文化的集体主义需求”会重新热衷于“家族集体主义”。^①

学者们在分析1990年代以来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因素时,还提到了农民的权利意识和公正观念。例如肖唐镖认为,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心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农民权利意识上升、相对剥夺感增强和组织能力提高,也与以城乡隔离为核心的宏观体制和政策以及干部作风有关。^②孔德永认为,“公正平等是农民对社会主义认同的心理追求”。^③

4. 关于农民政治认同的提升途径

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落脚点在于如何有效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赞同,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性工作在于满足农民合理的利益需求,郭正林的表述代表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农民的政治认同主要表现为对政府政策、政府行为、基层干部的态度、情感和议论等心理倾向”,“要提高农民对中央政策以及贯彻执行这些政策的基层干部的政治认同,最关键的是这些政策必须体现和维护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④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农民民主意识的提高,一些学者强调从民主和社会公正角度增强农民政治认同。例如李云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想完全赢得农民的信赖与支持,必须真正推行民主管理。”因为农民的基本物质利益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们对利益分配的公正性以及民主、平等等价值产生了需求。^⑤彭正德从类型学角度提出,我国当前应该构建民主权利型政治认同,其基础是社会公正,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通过促进社会公正来构建农民牢固的政治认同。”^⑥于建嵘也强调从社会公正角度增强农民政治认同,并进一步提出,要建立真正的公平公正体制,必须建立有效的民意表达机制,应当使农民的利益表达组织化,即让农民建立农会。^⑦

此外,一些学者从社会管理、政治传播、党的建设等角度探讨了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措施。例如李培林强调要注意诸如失地农民等那些利益曲线下降群体的社会心态变化,建立社情民意的反映和跟踪监测体系,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提高社会管理的技术水平。^⑧别红暄认为,必须营造富有成效的政治社会化体系和探索出适应农村需要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⑨唐玉环提出,要通过缩小城乡“知识沟”、培育和引导农村“意见领袖”、增加政府信息透明度和畅通信息反馈渠道、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积极功能,构建促进农民政治认同的信息传播机制。^⑩季丽新等人认为,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加强农村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发展党内民主。¹¹

(二) 研究评价:学术贡献与不足之处

国内学者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是在“三农”问题成为“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这两大背景下展开的,其研究目的是在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上构建良好的政治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最终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国内学界的已有研究成果为学术增长和政治实践发展

^① 郭正林:《家族的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政治文化认同》,《社会主义研究》,2002年第6期。

^② 肖唐镖:《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状况——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③ 孔德永:《农民政治认同的逻辑——以社会主义为对象分析》,《齐鲁学刊》,2006年第5期。

^④ 郭正林:《乡村治理及其制度绩效评估:学理性案例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⑤ 李云:《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党认同心理的新变动》,《青海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⑥ 彭正德:《世界范围内农民政治认同的类型与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3期。

^⑦ 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⑧ 李培林:《建设和谐社会应注意社会心态的变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9期。

^⑨ 别红暄:《论中原农村政治认同弱化的原因及对策》,《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⑩ 唐玉环:《论构建促进农民政治认同的信息传播机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6期。

¹¹ 季丽新,南刚志:《在新农村建设中加强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7年第3期。

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首先,深化了理论界对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的一种政治态度,在本质上是对政治权力的认可和同意,它涉及了政治领域内的核心政治关系:权威—服从关系。政治权力对政治服从有着天然的要求,但是“服从”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自愿和认同基础上的“诚服”;另一种是强制和威胁下的“屈服”。政治权力要转化为政治权威,就必须获得建立在自愿和认同基础上的服从,而权威—服从关系的建立意味着政治合法性的产生。正因为政治认同与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治认同问题历来是政治学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19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政治认同问题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学术兴趣,他们研究了政治认同的内涵、内容、功能和建设途径,并且围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分析,我国公民的政治认同状况、原因,以及如何防范和化解政治认同危机,这些研究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和颇有价值的结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一些泛泛而谈、对学术增长无益的低水平重复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呈增多之势,究其原因,除了研究者“简单套用西方学者的概念与话语来分析中国的问题”、“没有较好地研究与把握中国的传统与国情”^①之外,研究者对政治认同主体未作区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认同状况必然存在着差异,笼统地论述“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自然难以将研究推向深入。自古以来,农村与城市、农民与非农民的区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曾被国家政策所强化,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缩小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使研究内容更为具体,使学理性思考更有针对性,这无疑深化了学界对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

其次,拓宽了政治学界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的空间。19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引起了国内诸多学科的关注,经济学界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社会学界对农村社会问题的探讨,法学界对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努力,史学界对农村史料的挖掘,以及文学界对乡土文学的探索等,带来了“三农”问题研究的大繁荣。在这些研究中,政治学界的农村政治研究成了当今学术界的显学之一,^②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乡村政治社会与政治结构,代表性著作有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于建嵘的《岳村政治》、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郭正林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二是村民自治与乡村民主,代表性著作有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等;三是乡村治理与政治稳定,代表性著作有张厚安等人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项继权的《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彭勃的《乡村治理:国家介入与体制选择》;四是农民抗争行为,代表性论著有于建嵘的《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及其近年来发表的系列论文。除“农民抗争行为”的研究外,农村政治研究侧重的是国家政策变迁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这无疑抓住了农村政治的主要方面,有助于认识农村政治的运作并促进农村政治稳定和发展,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对国家和政策变迁中农民的感受和反应缺少正面探讨。从理论上讲,农村政治的健康运作以及农村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因此,农村政治研究有必要在以自上而下的视角研究国家农村政策和制度的同时,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研究农民对政策和制度的反应。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拓宽了农村政治研究的空间。

再次,丰富了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虽然致力于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学者,但由于政治认同属于政治心理范畴,其形成和变化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并且与政治文化、政治传播等因素有关,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需要从诸多学科的视角进行研究,单一的纯政治学视角难以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既有成果虽然不多,却体现了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传播学等诸多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

^① 孔德永:《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认同研究刍议》,《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② 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理论视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7期。

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在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在坚持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两种方法并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实证研究。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规范研究强调价值,实证研究强调事实,两种方法都是重要的分析工具,但是国内政治学界对规范研究方法的运用远远多于实证研究方法,甚至出现不少从政治报告到政治报告、从领袖论断到领袖论断的“注经式”研究。有学者曾对一段时期内发表的政治学方面的论文进行抽样,结果发现属于实证研究的论文仅占 1/3 弱,而且“多限于文献研究方式,而实地调查方式、统计调查方式相对薄弱”,因此政治学研究方法总体上还处于落后状态。^①尽管有些学者在大力倡导和努力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但从总体上看,政治学研究方法上的“落后状态”目前并没有得到多少改观。在这种形势下,学界关于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的方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这种研究秉承了农村政治研究注重实证研究的传统,并未将目光局限于农民政治认同的内涵和意义等价值命题,而是更关注农民政治认同的现状和原因等事实命题,强调访谈、问卷调查、测量、统计等研究技术的运用,因而给政治学的研究带来了新鲜空气。

第四,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加剧,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福利和水平总体上也远远落后于市民的生活福利和水平,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在税费征收、乡村选举、土地征用、利益分配等问题上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冲突,结果导致农民的不满情绪和乡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使得维护农村政治稳定和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的形势较为急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农民政治认同问题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因为政治认同是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社会心理基础。学者们的研究体现出服务于政治建设的价值取向,不但强调农民政治认同建设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前农民政治认同的面貌,探讨了农民政治认同形成和变化的原因,并提出了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措施,为党和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客观上有助于维护农村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在充分肯定国内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所作出的贡献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多,而且研究不够深入。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目前,国内尚未出版研究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专著,相关的论文也很少,而且这些论文大多数是在研究某个问题时提及了农民政治认同问题,这反映出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既不深入,也不系统。从地理范围看,学者们选取的研究样本很有限,还很难反映出某个区域农民政治认同的整体面貌;从历时角度看,既有研究涉及改革开放前和 1990 年代末至新世纪初这一时段的相对多,而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展开后这一时期的研究非常少;从政治认同主体的类别看,研究者大多是从整体上观照“农民”,并未对农民这一群体从年龄、文化水平、富裕程度、生活阅历等角度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亚群体;从政治认同的对象看,研究者尚未对农民政治认同的结构层次作具体的描述和分析,例如,郭正林以认同对象和认同程度为标准将农民政治认同结构分为八种类型,^[25]但他并未具体论述高坝村农民在这种结构中的分布状况;从所涉问题的深度看,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尚未深入探讨,比如,当前农民的绝对生活水平远远高于解放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为什么反映农民政治认同下降的群体事件却也远远多于这两个时期?

第二,研究的理论高度不够。国内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虽然既有实地调查又有学理分析,但是没有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如何站在理论的制高点上高屋建瓴地观照农民政治认同问题,需要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本人粗浅地认为,应该把农民政治认同的发生和变化视作农民与政治权力之间持续进行社会交换的过程,并把农民政治认同问题放在我国

^① 肖唐镖、陈洪生:《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分析》,《政治学研究》2003 年第 1 期。

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加以考察。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也是一个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迈进的过程，与传统国家相比，“现代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民族—国家，一是民主—国家，前者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主权为核心；后者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①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政治权力向上不断集中、向乡村社会不断渗透，并要求获得农民的政治认同，农民则基于自己的理性和利益需求及其满足程度决定对政治权力的态度，而且随着现代国家建构重心由民族—国家转向民主—国家，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因素也在发生着变化。

第三，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学界进行实地调查的力度还不够，而且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还不够规范。比如，有的学者基于有限的档案和文件资料，把农民加入合作社基本上看作是政治强制的结果，但据本人基于大量档案资料的研究，农民加入合作社主要是因为他们认同合作化政策。再如，本人曾以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国家为基础将农民政治认同抽象出暴力威胁型、经济利益型、思想教化型和民主权利型四种基本类型，而有学者通过实地调查“归纳总结”出“后农业税时代”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类型分为经济利益型、思想教化型、民主权利型和政治效能型，而且“农民政治认同的社会基础已经转移到社会公正观上”，但论文作者所论述的调查情况并不能为这种类型划分提供充分依据，更无法证明当前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是社会公正，其研究也就存在以调查数据迎合先入之见的“伪实证”之嫌。当前，要深化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必须切实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

（三）研究前景：论题价值与深化方向

任何社会都内含着趋向一致的力量和导向冲突的因素，一致是社会实现良好秩序的基础，冲突则可能酿成毁灭性的社会动荡。政治学关注的是如何减少社会冲突以构建良好的政治秩序。从政治学角度看，良好的政治秩序依赖于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整合，整合的基础在于构建社会成员普遍的政治认同，“如果没有公民的普遍理解并接受它的统治，国家便不可能在税收、对外政策、教育、社会治安以及无数其他事务中顺利行使自己的职能。”^②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表明，农民的政治认同对于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秩序的稳定至关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农村和农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排挤并不断被边缘化，但同时，现代化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又不断瓦解着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并将其纳入统一的社会文化之中，结果“现代化使农民劳动和福利的客观条件恶化”的同时“也导致了农民的渴望上升”，容易滋生农民的不满情绪，“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正在拓宽的制度内”，农民的政治认同决定着政治秩序的稳定：“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如果它积极反对这个制度，它就会成为革命的载体。”^③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农村社会积累了一些不满情绪和不稳定因素，以致引发了不少群体性事件和抗争行为，引起了我国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于是农民政治认同便成了目前我国学术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之一。

但是，国内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较浅的层次，亟需深化。本人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深化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

第一，应加强对农民政治认同与农民行为、国家政策和制度、政治稳定和相关性的研究。在当代中国，农民以其一系列自主行为推动了国家政策和体制的变迁，形成了独特的“创造性政治”，“如果说是市民改变了西方国家，那么，农民则改变了当代中国。”^④而“创造性政治”存在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农民的政治认同，它决定了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创造的。政治认同是一种政治态度，属于政治心理范畴，心理影响和支配行为，行为改变政策和制度，政策和制度干预和影响心理，其良性互动带来政治稳

^① 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

^② [美]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③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6—271页。

^④ 徐勇：《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

定和政治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渗入乡村社会，颠覆了乡村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并塑造了新的利益和政治格局，此后，政治权力主导下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不断改变着农村的生产关系、权力结构和社会面貌，也不断干预和更改着农民的政治和社会心理，影响农民的政治认同，农民则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推动政策和制度的变迁。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实现农民的政治认同与其行为、国家政策和制度之间良性互动以维护农村政治稳定并推动乡村政治发展？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应加强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治认同的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展以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农村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农民的政治认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如何借助国家的新农村政策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学界鲜有研究，为此，必须加强实地调查并进行学理思考。当然，中国农村地域广阔，要在所有的农村社区展开调查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在类型划分的基础上选取不同的农村社区开展个案研究。在调查设计上，应该注意考虑三个问题：一是要调查分析不同阶层农民的政治认同状况，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农民阶级分化成许多阶层，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在职业、收入、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二是要调查分析不同年龄阶段农民的政治认同状况，年龄是生活阅历、政治认知方式、政治社会化程度等的表征，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其政治认同状况往往存在差异；三是要调查分析农民对政治价值观、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政党、政策及其执行者等政治系统不同层面的政治态度。

第三，应加强对农民政治认同机制的研究。要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切实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必须探寻和把握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机制。这里的政治认同机制，是指农民政治认同发生和变化的原理和规律，涉及农民政治认同的动力、条件、影响因素以及政治认同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是农民的行为动机和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政治传播效果以及农民的生存环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农民政治认同机制具有相对稳定性，通过它我们可以更好地对农民政治认同的发生、变化进行科学的解释和适当的调控，从而有效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可以说，相对于在个案基础上描述和分析具体的农民政治认同状况而言，对农民政治认同机制的探讨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

三、研究方法

本书是关于农民政治认同的一项实证研究，具体包括实地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实证研究，它是一份笔录，是有关全部调研过程的真实记录；它又是一份证据，是对确定事实有效性的判断；它还是一份呈词，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主张和说明。它不仅表明了一个研究者的技术手段，而且更能体现一个学者的学术品格。”我们不能因为实证研究“正在败坏着名声”而拒绝使用这一方法，^①这一论断既坚定了我用实证方法研究农民政治认同的信心，也提醒了我严格遵守实证研究规范的重要性。

实证研究通常需要选择一定的个案作为研究样本。样本范围过大，可能导致研究难以深入，使研究失去个案研究的意义；样本范围过小，又容易限制研究视野，从而降低个案必要的代表性，因此研究者总是根据研究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研究个案。本书研究的是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政治认同，在我开展田野调查时，新农村建设也只开展了四年多时间，因此这项研究不是能够体现历史厚度的长时段研究，而只是就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时点或横切面展开研究，选择单个村或单个乡作为个案显然是不合适的，必须要适当扩大研究样本的范围。鉴于这种考虑，我在个案的选择上没有局限于单个村或单个乡，也没有选择某个县作为研究个案，而是选择湖南省五个县中的十个村作为个案，开展区域政治研究。个案村所在的五个县是醴陵市、湘潭县、湘乡市、衡山县、长沙县，之所以选择这五个县，一方面是因为，这五个县是毛泽东同志1927年初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调查过的五个县，非常具有历史和政治意义。毛泽东同志在对上述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调查后，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力地回应了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并为党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八十多年后重访毛泽东考察农民运动的乡村研究农民政治认同问题，也许本身就是一项很有学术意义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湖南自近代以来是农民问题比较突出的省份，而湘潭、醴陵等五县的乡村社会在湖南和我国中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总感觉到，它们在建国以来的发展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浓缩了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心理变迁的历程，因此对于农民政治认同研究极具研究价值。

个案村的选择则体现了随意性和随机性，基本原则是每个县选择两个村，而且这两个村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乡镇。由于我写《生存政治》时在醴陵市的清泥村做过田野调查，一来为

^① 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8页。

了田野调查的便利，二来考虑研究的延续性，我把清泥村作为这项研究的个案村之一。此外，绍庄村因《岳村政治》而在学界很有名气，我也把绍庄村选为了个案村。其余的个案村都是随机选取的。最后选定的个案村分别是：湘潭县分水乡的旗山村和梅林桥镇的梅林桥村，湘乡市月山镇的西林村和栗山镇的西山村，醴陵市新阳乡的清泥村和东堡乡的新安村，衡山县开云镇的龙泉村和白果镇的绍庄村，长沙县跳马乡的石燕湖村和星沙镇的石子村。

田野调查的过程大体上分为两个步骤。2010年7月初至10月下旬，我深入上述十个村进行访谈调查和实地观察，访谈对象包括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具体地点主要是农民家里，也包括田间地头，比如在湘潭县，我曾在西瓜棚中访谈农民，曾在稻田里参加农民的早稻收割，通过访谈和观察，我收集了大部分访谈资料和相关文件、数据资料。在此基础上，我设计了“农民政治认同调查问卷”，并于2010年11月2日至11月12日带领政治学理论专业和科社专业部分硕士研究生在上述十个村开展问卷调查。参加问卷调查的硕士生总共13人，由我亲自带队，逐村发放问卷，及时总结，期间，我还抽时间进行过一些访谈。问卷调查以匿名方式进行，不填写受访者姓名。问卷发放的基本原则是，每个村100份，由调查员随机入户调查，指导农民填写调查问卷，一户家庭一般发放一份问卷。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因有的村人口多有的村人口少，有的农户没人在家等因素，各村发放的实际问卷数并不相同。总共发放问卷963份，回收有效问卷945份，无效问卷包括未完成问卷和随意敷衍问卷，比如有的农民回答问卷问题不到一半，有事情走开了或没有耐心完成，有的农民要求调查员让他自己填写但明显随意划勾。按有效问卷来看，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村庄名	旗山村	梅林桥村	西林村	西山村	清泥村
问卷数	100	99	90	97	102
村庄名	新安村	龙泉村	绍庄村	石燕湖村	石子村
问卷数	103	67	73	111	103

问卷调查对象基本特征的分布状况如下表所示：

特征		频数	有效百分比
性别	男	534	56.5
	女	411	43.5
年龄	18—30岁	117	12.4
	31—39岁	130	13.8
	40—49岁	254	26.9
	50—59岁	185	19.6
	60岁上	259	27.4
文化程度	文盲	36	3.8
	小学	306	32.6
	初中	388	41.3
	高中	137	14.6
	职高、中专、技校	38	4.0
	大专	26	2.8
	大学本科	8	0.9
身份	现任村干部	24	2.5
	曾任村干部	74	7.8
	村民代表	35	3.7
	一般村民	812	85.9
	党员	121	12.8

田野调查结束后，便是访谈录音的文字转换和整理、问卷的统计分析和文献资料的分